

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

纪 健 生

吴孟复先生，名常焘，字伯鲁，改字孟复，以字行；号山萝，别号勉堂，室名商邃室。1919年2月3日生于安徽庐江县之吴家小圩子，因地近著名的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故称三河人。

先生幼时，其家在江北的庐江和江南的郎溪有些田地，在芜湖城中亦置有房产，家道还算殷实。先生为长孙，深得祖母喜爱，出生不久，即抱在身边，亲自照看，一应衣食眠起等事不让别人插手。稍长，便口授诗词，先生聪颖异常，往往一过成诵。由是更受祖母宠爱，五岁即送入私塾读书。先生于书盖有宿缘，不仅读书勤奋，而且要每日必读书，才能精神好，吃饭香；每晚必读书或背书，才能入睡快。有一次发高烧数日，昏迷不醒，家人心急如焚，忽于半夜醒来，张口便要拿书来读。祖母虽对他宠爱，但并不溺爱，经常严加督责。也不时劝勉他说：“只要你争气，好好读书，将来有成，也不枉我疼你一场，别人也不至于说我偏心了。”又常讲些族中旧事来激励他，如说某族人因读书无成，没中个举人秀才的，与有“功名”的人打官司，人家在堂上站着讲，自己只能在堂下跪着说，先折了锐气，有理也变成了无理。在先生幼小的心灵里，便产生了非刻苦读书不可的压力。初读《四书》是听别人朗诵便记住了的；尤喜读《孟子》，从孟子与梁惠王很传神的对话中，他初步领略了读好文章的愉悦感。读《四书》的同时，他还自己读了《尔雅》、《说文解字》，虽是朦胧看过，却也产生了对语言文字的兴趣。8岁时，已能写诗作

文，一时被乡人传为美谈。

11岁时，离开祖母怀抱，到芜湖接受父亲管教。父亲很严厉，对读书抓得更紧。家中厅堂内悬一对联：

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写字，能有几何？恐至老无闻，
趁此日埋头努力；

世事艰难，即寻常穿衣吃饭，亦非容易。念在勤不匮，
免他年仰面求人。

父亲在家时，每日在这里检查他的课业，并要求把对联诵读一遍。先生其时入芜湖广益中学读书，对军阀混战，百业凋敝的社会状况已略能体认，读书的压力在心内又添了一重。

除在校学习规定课程如国文、数学、外语等之外，家里还专门延请塾师教诗文。先是一位张仿舜先生，教读李、杜、韩、柳、欧、曾、苏、黄诸家诗文，又让读了黄景仁、龚自珍、谭嗣同、苏曼殊等家诗文。唐宋诸家之博大精深，清代诸家之个性鲜明，使他悟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妙之处，也体会到系统阅读别集的益处，萌发了研究古代诗文的愿望。后来是段熙仲先生，指导诗文之外，还给他介绍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传统，又指点他读了《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更使他开拓了眼界，扩充了心胸，懂得了诗文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也懂得了学问之事，并不只是为个人、为家人，也不仅在于广见闻、谋衣食，还有一种更高尚、更重要的目的和意义在。小小年纪，便立下了终生献身学术的志向。

父亲在外管理田产，有时回家给子侄们带些书来，先生总是争先恐后地拿来阅读。有次带回来一部《高邮王氏四种》，先生一读即爱不释手。由于已读过《尔雅》和《说文》，对高邮二王“巧诂不违”的训诂方法感到兴味无穷。12岁时，同乡刘声木先生赠给他家一部《直介堂丛刻》，其中有刘撰《桐城文学渊源考》和《桐城文学撰述考》，先生取读之，虽不甚懂，然从此知有

“桐城文派”。父亲平时喜读《资治通鉴》，先生有时也趁空拿来翻读，久乃渐熟，尤其是史传文学的风格，使他体味到文史相通的道理。

虽说家境比较富裕，但先生在芜湖读书的几年，生活却是相当清苦的。白天在学校，晚上回家受塾师指导，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只有每周六晚上，才能由人带着上一次街，进澡堂洗一次澡，或进戏院听一场戏，吃上一包瓜子。数年苦读，先生不仅完成了初中学业，接触了当时不少新鲜的知识，而且在语言、文学、史学以及文献学等方面打下了较为全面而坚实的知识基础，尤其对皖江南（徽州朴学）北（桐城文章）之长，情有独钟，并形成了学究本源，博采兼收，不主一家，重视方法的读书学习特色，同时，在诗文写作上也已臻于一个相当成熟的境界。

1933年，先生14岁，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招生，即奋然前往投考。虽成绩合格，但口试时却被淘汰。其时，口试由校长唐文治先生亲自主持。唐先生双目失明，适逢钱钟书先生赴锡探望在国专任教务长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临时帮办考务，负责念口试名单和某些事先拟定的口试题。当问到曾读何书时，先生尽其所学，作了回答，唐先生还比较满意。唐先生突然问道：“吴世兄将来欲从事何种学术研究？”先生答道：“欲致力于考据之学”。唐先生拂然不悦，遂不录取。先生少年气盛，亦拂袖而去，大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慨，作《别惠山》诗二首，便回芜湖。回家后，总感到委屈，便致书钱基博先生，痛陈郁愤。钱先生立即答书劝慰，并言：以足下之才，不投考国专，将来亦必有成就；若仍有意于此，请不必灰心，明年再来投考。

1934年夏，先生改了一个名字，再次赴无锡投考，考试合格，口试由钱基博先生主持，遂被录取。入学后，唐先生发觉，告诫他说，不能停留在考据之学上，要进而治义理之学。并讲了做学问易、做人难的道理。先生在50年后写的《追怀唐蔚芝夫子》

诗之三中表达了对这位先师的无限崇敬之情：

考据词章身外物，人生第一在为人。

回头多少崎岖路，始信先生教诲真。

对钱基博先生的知遇之情，他也是终生感激的：

犹记梁溪应试来，搜遗竟许少年才。

那知白首无成就，一度思公一自哀。

（《幼学杂忆》诗之三）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虽仅是一所私立专科学校，房屋十数间，教师十余人，然而却以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为目标，治教有方，学风端正，已培养出如唐兰、吴其昌、钱仲联等后来名噪学界的学者。校长唐文治先生，德高望重，硕学宏文，年届70，主持校务并亲自授课，虽双目失明，而讲诵如常人。他为学生讲群经大义，讲宋明理学，指导学生读王守仁、陆陇其、陆世仪三家著作。不讲课时，也在校长室正襟危坐，直至放学，其风神令人敬畏，令人感奋。陈衍先生，一代诗歌理论家和诗史专家，著作等身，以80高龄，讲授汉唐以来诗歌，尤喜讲宋诗和近代各家诗，结合个人经验，讲得生动淋漓。钱基博先生，主持教务并讲授经学、版本学和近代诗文，也讲他的韩愈研究。此外，顾实先生讲《中国文化史》和《汉书艺文志》，叶长青先生讲《文史通义》，冯振先生讲诸子、《说文》及七绝作法，还有王遽常、钱仲联、朱东润等先生。唐先生还经常从外地聘请学者来校讲学，如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长的柳诒徵先生等。

国专所用教材皆为经史子集名著和当时著名学者的专著，学生亦以读专书、读原著为主，教师讲授，重在指导读书和诗文写作，指点治学门径与方法。有些老先生积累一生的体会和经验，更是任何书本上也都没有的内容。

国专师生关系和谐，学术风气浓厚。师生之间，义兼师友，学生称老师先生，老师称学生世兄，上课时，老师如话家常，学

生如坐春风，吃饭时，老师一桌居上首，学生饭桌在旁边，白发老人，红颜少年，融融泄泄，亲如家人。同学少年，皆为一方才俊，入学前就多饱读诗书，且各有师承。同窗之间，或切磋商量，或往复问难，俱能收取长补短之效。课外各种学术活动尤其是诗社活动十分活跃，太湖之滨，惠山之麓，弦歌之余，吟咏不辍。马茂元、王先猷、郑学弢、姚奠中、冯其庸、周振甫、王绍曾等，皆先生当年同学。

先生在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环境中，日近师友，时游湖山，不仅学业大进，而且诗文日佳。唐先生之理学，陈先生之诗学，钱先生之文献学及朴学治古文之法，给他留了深刻的、也是终生的学术烙印。传统学术的熏陶，名师的指引，同学的帮助，使他不仅成长为一位风华正茂的学者，而且成了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

1937年夏，先生从国专毕业。毕业时与同学10人出版诗集《惠麓同声集》，自比于“大历十才子”。梁溪三年，先生对国专治校方法、教学特点、名师风范、学术气氛以及师生之谊，体会犹深，故毕业论文写的是《书院考》，并决心一面致力于学术研究，一面从事教书育人。刚刚成年，就立下了既作经师又作人师的志向，而这一志向的确立，为他此后近60年的生活定下了基调。

先生在国专读书期间，利用假期和水陆交通之便，历游苏沪等地及皖江南北，访师求学，得见当时许多著名的学术前辈。1935年2月，与同学马茂元一起去桐城，拜见了与廖平并称“天下两大经师”也是桐城派大师的姚永朴先生以及方彦忱先生；其后又至上海，拜见了庐江前辈、著名诗人陈诗先生，诗人、古文家袁思亮先生，著名出版家李宜龚先生。其后又拜见了歙县许承尧先生等。先生一见诸老，即承厚爱，许执弟子礼。姚先生为其讲经学和桐城文法；陈先生指点诗法，并将其诗多首录入《诗话》，

袁先生为他批改诗文，指点途辙；李先生于诗学之外又指导他对梅尧臣的研究。诸老既为师长，又交忘年，与之怡然唱和，对其诗赞赏有加：

袁思亮评曰：“曲达而健，举阳刚阴柔之美，兼而有之。少年造诣至此，平生所未见，为之狂喜！”

陈诗评曰：“奔放似赵秋谷，道逸似戴存庄，出入渔洋竹垞之间，由此进至三唐，所造未可量也。”

李宣龚评曰：“作者先治古文而后为诗，故其根柢槃深如此，可敬，可畏！”

许承尧评曰：“托意渊微，修辞雅洁，艺林中隽才也。”

方彦忱评曰：“以淡朴之语，写浓挚之情，居然梅都官矣。”

仅从诗作一个方面，亦可见先生之谦虚好学、转益多师，兼采诸家之长和水平提高之快。

这期间，先生还拜会过马一浮先生，以后一直有书信往来和诗作赠答。又因袁思亮、姚永朴的介绍，见到过陈三立先生，对这位光宣诗坛领袖、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太老师，先生无比崇敬。1937年散原先生去世，先生曾撰寄挽联云：

风气辟湖南，他日人应思此老；

烟尘昏塞北，诸君何以慰诗灵？

抗战胜利后，散原移葬西湖，灵柩过上海，先生随李宣龚、张元济、陈叔通等迎祭，作长诗悼念，其中一节叙述了这一跨代交往：

蚩蚩好弄儿，公独赏殊俗。

广坐一掀髯：“此子不碌碌。

年少已如此，他日谁能域？”

逢人道姓名，已厌犹反复。

闻者或相笑，受者颜忸怩。

他还曾去苏州听过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演讲，请教过语言文字

方面的问题，太炎先生逝世，他随国专诸老之后参加了葬礼。

先生自幼喜读龚、魏之文，同学马茂元先生劝他学为桐城之文，先读梅曾亮《柏枧山房集》，两月而毕，发表于《国学专刊》的梅氏《年谱》之撰，即始于此；再读张裕钊、马其昶、范当世以至归、方、刘、姚之文；又读姚永朴《文学研究法》，35年初，见姚于桐城，年底，见袁思亮先生于上海，皆曾请教桐城文法，其后为文，即主要写桐城派文章。又在马茂元先生家中，读到马先生祖父马其昶先生的《屈赋微》、《老子故》、《庄子故》等著作，得窥马氏治学阃奥。

在国专学习之外的拜师求学，使先生对中华传统学术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与把握，进一步构筑和完善了他的知识结构，也极大地丰富了知识与能力的储备。他此时的特点，可用陈诗先生赠诗中“旧学肯深好”，“少年奋文藻”两句来概括。而他在《七十生日述怀》中所写的“生迟何敢望乾嘉，犹见光宣几大家”，也正表示了他对国专时期校内外求学一段千载难逢的机遇的无比珍视。先生注定要成为一位继承、弘扬、传递民族传统学术薪火的学者。

先生毕业，正值抗战开始，国事扰攘，毕业即是失业。于是至桐城，再从姚永朴先生学习经学、诗、古文，旋即侍姚先生避地宿松，辗转湘汉，两年间，尽悉姚先生之学。39年底，姚先生病逝于广西，归葬桐城；先生亦回到故乡。

1940年，先生靠在地方政府、军队中任科员、秘书等职以谋生，1943年上半年，兼任过一段私立东南中学校长，这是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之始。学校为日寇焚毁，先生率学生避于皖南山区竹林中，惊恐忧虑，其诗作《江南》三首写于此时。也就在这时，先生学会了抽烟、饮酒、下围棋。

1944年，先生到芜湖安徽学院任讲师，此为先生从事高等学校教学之始。1945年秋，日寇投降，先生闻讯赋诗道：

家祭叮咛陆放翁，千秋悲喜一宵中。
天边笳鼓喧如此，地下音书或可通。
痛定几村闻野哭，疮多满目望年丰。
扶伤吊死肝肠热，衮衮诸公意应同。

不久，即到当时尚在屯溪的上海法政学院任教授，教《中国通史》和《基本国文》。时年26岁。

1946年秋，到上海，任上海暨南大学副教授，教《国文》与《诗选》，同时兼任上海法商学院副教授，私立新民学院副教授、中文科主任。当时暨大有刘大杰、郑振铎、许杰、刘纪泽等先生，先生既把这里当成一个施展治学育人抱负的佳处，又认为得到了一个求知问学的良机。他向刘大杰先生请教中国文学史问题，对郑振铎先生的话“吾辈治中国古诗文，盖将以为学，而非以为文”奉为座右铭。而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的刘纪泽先生，则向他介绍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特点，先生自置私淑之列，于三家著述如《观堂集林》、《清代学术概论》、《元白诗笺证稿》等一直放在案头，研读揣摩。

先生此时把全部时间投入教学和读书治学，争取补回8年来失去的时间，毅然把酒瓶和围棋盘、棋子从窗口丢出去，以示决心。他利用业余时间，每次向图书馆借《丛书集成初编》5册，一二日内读完，再换5册，二三年间，全部读完。1948年，先生《古文例论》（油印）被作为暨大教材使用，《黄山谷诗补笺》由文献书局出版，这是先生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任上海期间，由于唐文治、李宣龚、柳诒徵先生等师长均在上海，先生于暨大工作之外，又得从师之乐。他经常参加李宣龚先生的硕果亭诗会，并因之与钱钟书先生第二次谋面，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接触；每逢星期天，还与在沪国专同学一起去唐先生处听讲，先生坐谈竟日，一如在国专时。他在暨大见到过乡前辈、美术大师黄宾虹先生，谈及《中华美术丛书》的编校注补等

事，一夕之谈，先生耿耿在心，竟至于40年后亲自主持重修黄书。

尤其是柳诒徵先生，对先生教益和影响更大。先生于幼年时即读过柳先生的古文和诗作，在国专读书时学过他的《中国文化史》，聆听过他的讲学，对其所论“清儒考证多出宋贤”的观点记忆尤深，在抗战时期，亦曾有书信往来。虽心仪已久，终未能结师生之谊。先生至沪，方遂渴慕之心。1949年秋，上海解放，柳先生主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组，引先生参加，更得朝夕相处，因从学习目录、版本及图书管理之学。先生自幼对读书治学方法有所追求，柳先生为史学大师，又通经学、文学、哲学等，尤长于文献之学，因叩问读书治学途径与方法，柳先生以其师缪荃孙先生之言答之，以为当以《汉书艺文志》标志的目录版本之学和《说文解字》标志的语言文字之学为基础。先生拜受，持之终生。而多年所学，一旦有以贯穿，如网提纲，如裘挈领，如登高山，如观河源。柳先生对他来说是一位总结性的老师，在《劬堂夫子逝世三十年纪念献诗》这首长达158句的长诗中，先生详尽地记述了柳先生对自己的言传身教：

沪上聚名流，祭酒公无让。

煮也操纸笔，窃喜近函丈，

光风霁月中，尽洗尘烟障。

入门亲罄欬，出户持几杖。

“大陆”收国玺，白云观《道藏》。

铁琴铜剑藏，真赏窥形象。

过目宋元刊，点画指字样。

鉴别辨楮墨，沿革说装潢。

.....

治事必躬亲，大小无所旷。

簿录每亲与，抱书比运盎。

互著与别裁，名实必精当。
一丝有不苟，此风真当倡。
诏我读书法，班许为门阅。
渊源溯《七略》，文字补《凡将》。
岂徒夸耳目，将以穷真相。
一曰经皆史，二曰铜出矿。
三曰训诂通，四曰义例创。
析义入毫发，会通波澜滉。
文史与儒玄，岂复异迹迹。

1950年，全国解放，先生欲回故乡。适有友人在滁州工作，力请先生主持滁州中学教务，先生欣然就任。以先生之学问文章和平生抱负，又从事高教多年，当一中学教导主任，不仅没有大材小用之感，反而觉得自己得前辈师长教诲，偏受已多：尤其是前辈中如姚永朴、陈诗、方彦忱、许承尧等皆皖籍人，自己承教以来，未为家乡出尺寸之力，这次到滁，正得其所。他以学者的严谨和师长的慈爱投入工作，拟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运行，检查工作情况，指导青年教师，并担任高中语文课教学。晚上，必深入教室、学生寝室，听取学生意见，解决学生困难。师生对他又敬又爱，不时登门求教，不顾早晚，直到夜深人静之时，才能坐下读书、备课、考虑工作。滁州中学高考升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成为安徽省重点中学。

由于在滁中工作成绩显著，1956年春，被调至合肥教师进修学院（后改为合肥师专、合肥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离开教学岗位，到校图书馆从事古籍编目工作。

到了图书馆，先生置个人遭遇于度外，全力投入古籍编目工作。合肥师范学院图书馆藏古籍数十万册，甲于皖省。先生不仅得到了一个寝馈书丛的机会，而且在国专和从柳诒徵先生所学目录、版本、校雠、辨伪等知识亦能用长。他如鱼得水，干脆吃住

在编目室。先生此时身染肺疾，一米八几的身高，瘦得只有40多公斤，不到40岁，腰已弯曲，倒象60岁的老人。但是，他的身体里却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他用绳子把书捆成小捆，弯腰曲背，咳喘不息，顺着楼梯护栏，从一楼书库朝二楼编目室拖，然后再整理分类，著录制卡，再送回书库插架。有时还要鉴定版本甚至修补旧书。其时，先生对两件古籍的鉴定，为人称道。合师院有一部800元购进的“宋版《史记》”，牌记上云“淳化壬辰临安余氏万卷堂刊，”先生一见即定为赝品。因为淳化为宋太宗年号，其时不得有“临安”之名；余氏在闽之建阳而非浙江。观其纸墨行格，当为明代震泽王氏刊本，以《中国版刻图录》验之，果然。又有人持“《宋本易经》”向安徽省馆求售，书签上“宋本周易”四字为张謇手书，见者多以为可信。先生被该馆请去鉴定，先生一见，即定为明覆宋本，查《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行款果然一致。

先生白天劳累，晚上却更加忙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还要为登门求教的师生查阅资料、解难答疑。他虽任教仅仅一年，但其博学多闻却广为人知，不少人不避嫌疑地去他那儿请教、商讨甚至长谈。先生小叩大鸣，问一答十。有的教师备课，只要说是上什么课，先生便会把参考资料找齐送上。当时，张须先生与他过从甚密，曾在赠诗中写道：

季子知新与俗殊，撑肠万卷有如无。

曳裾时近多闻友，排闥常亲未见书。

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先生手自整理，多经翻览、阅读，以至文革以后，有人利用馆藏，还来向先生咨询、请教。

右派问题获甄别后，先生虽仍在图书馆工作，却得到了重新走上讲台、传播知识的机会。他为艺术系学生讲诗词欣赏，为中文系学生讲唐宋文学，深入浅出，妙语解颐，不仅知识量丰富，

而且重在指点读书与治学方法。如讲到宋代张孝祥的《西江月》词：“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十里秋光。江神留我看斜阳，吹起鳞鳞细浪。”有学生指出“明月”与“斜阳”显然矛盾。先生肯定其读书之细，说明此词选自明人《六十家词》本，顾炎武所谓“明人好刻书而书亡”也。又举双照楼覆宋本《于湖词》作“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融目录版本之学于诗词阅读欣赏之中，学生大为叹服。又曾讲唐代王维《送李梓州之蜀中》诗之尾联“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以韩愈《蓝田丞厅壁记》为例，说明唐代文人仕宦失意，每有“不问公事”以鸣清高者，又以王维《赠刘蓝田》诗中“诤肯无公事，因君问是非”与此互证，指出上联之“汉女输橦布”，言赋敛尚重，“巴人讼芋田”言讼狱犹烦。合而观之，知王维意在说，此时不同于文翁之时，李梓州不当仅效文翁之教授而不务民事也。同时也指出“不敢”之正确，并非“敢不”之讹。征文考献，知人论世，合以训诂，审其词气。先生虽仅为大学生讲一小诗，而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融科研于教学，教能力于知识，使学生之收益，大大超出了所谓课堂教学任务的范围。

先生虽处逆境中，但读书不辍，深思不停。57年最苦闷的时候，却利用图书馆条件，继续20年前李宣龚先生指导的梅尧臣研究，针对张师曾所撰《梅谱》的不足，以十年之力，撰成《梅尧臣年谱》，因文革动乱未能出版。该谱考辨梅尧臣家世、生平、交游、著述、哀荣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2年，发表《杜甫过洞庭湖诗辨伪》于合师院学报第3期，从版本来源、诗中异文、历代观点、杜甫经历以及该诗与杜诗内容风格的比较，利用丰富的目录、版本、校勘和文学、历史知识，认为该诗是宋人学杜的“窗课”。63年又在合师院学报、江淮学刊上发表《关于杜甫卒地问题》、《梅尧臣》。1963年，在《新建设》第8期发表重要论文《试论韩愈的政治思想——兼与王芸生先生商榷》，不同意对韩愈

贬斥过当、言非其实、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加以充分分析的评价态度与方法。先生以他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熟悉，结合历史记载，从当时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如宦官专政、藩镇割据、佛道盛行等入手，分析了韩愈的政治态度，还分析了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其哲学著作《原道》的中心思想，以及韩愈对人民的态度，得出了韩愈属于中小地主阶级而非世族大地主的结论，实事求是，深入细致，20余年后，有关评论文章还认为先生持论公允，态度平和。这篇论韩的文章，应该说是先生从幼年读韩文起对韩愈认识的总结，也是对钱基博、姚永朴先生以朴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发展。同时，在《安徽日报》上连载《书林漫话》。

正当先生欲以平生所学致力于教学科研，即将结出丰硕成果的时候，文革爆发了，他自然在劫难逃。先是被打成牛鬼蛇神，批斗劳改，1969年冬，被强行遣送农村，先生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与两个插队农村的女儿在一起，于是被安排在砀山县距县城30余里、地处豫皖交界的农村。先生肺病加剧，农村缺医少药，加上生活困难、身体劳累，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而感到最大的苦恼是没有书读，也不能发挥特长。于是，他见到书就读，马列毛选，两报一刊，甚至农技医药书籍，靠这些文字激活自己的思维。读毛选，他咬文嚼字，划段析句，后来竟然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发现与桐城派文章的相通之处。他也攻读马列著作，梳理几十年来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方法，检讨从前辈诸老继承下来的学术得失。一有空闲，他就步行去县城借书，或托人辗转相借。先生读书极快，又是在一种极度的文化饥饿中，无论怎样设法，书总是供不应求，他便回忆过去师长的言谈，背诵读过的诗文。他坚信，一定会有让他发挥专长、作出贡献的一天。

1974年底，有关部门同意先生到刚招收第一批学员的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任教，75年初刚过春节，他就来到地近东汉哲学家桓谭故居、当时十分简陋的学校，开始了他一生中时间最长、

成果最丰的一段学术生活。

先生一到淮北分校，立即投入教学和《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为已荒废多年的教师和学员讲课，编写讲义，具体指点词典编纂的收词、制卡、释义等，尽最大努力让师生很快地掌握自学方法和初步的科研方法。他感到从师读书50年，这回真要好好发挥一下平生所学了。当时，他单身一人到淮北，吃住都有困难，身体又差，却不顾一切地忘我工作着。同时，他自己也在进行着知识结构的整合修复。他的窗口，灯光总是最后一个熄灭，深夜二三点钟，经常能听到他咳喘着翻动书叶的声音，有时灯光竟是彻底明亮。他还同时负责指导阜阳分校的一个词典编写组。《颍州校书夜坐呈诸公》，是他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首诗，从中可看出他当时的工作精神与心情：

鸳鸯绣罢几回看，不为金针欲说难。
岂爱风流高格调，拟从江海助波澜。
语当通俗谈何易，词必寻源意始安。
最喜主人能好客，西湖小住竟忘还。

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先生作诗，有“但愿桑麻能遍野，便同燕雀荷生成”之句。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先生写出平生第一首快诗：

妙手从来似化工，嘘枯力有速于风。
始知造化成才易，不信诗人到老穷。
好雨滋生新卉绿，晚霞染出暮山红。
一生吟得诗千首，今日诗成兴倍浓。

此诗后来被收入《五四以来诗词选》。

78年底，安师大淮北分校改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属煤炭工业部。79年，先生彻底平反，恢复教授职称，任学院图书馆长。他亲自带人赴京津等地采购图书资料，主持编目工作，为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日夜读书，指导别人读书，他的口头禅

是“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由于学校领导关怀，医疗条件改善，他的肺病已基本稳定并有好转，只是烟戒不掉。由于资料缺乏，先生接受校内外甚至省内大量的学术咨询，来人则谈，来函必复，一时被人誉为“活字典”。其实，先生虽博闻强记，但深感知书、求书、用书是治学的根本，答复咨询时，不仅内容结果原原本本，而且寻检方法清清楚楚。故为慎重起见，亦常常翻书，有时为一条资料费时数日。其时，他利用资料条件、整理补充曾发表过的有关读书治学的文章，撰成《读书与治学》一书，又写成《屈原九章新笺》初稿，二书均由学院自印，供师生阅读和征求意见。当时，先生在皖省与安师大张涤华先生齐名，有“南张北吴”之称。

1981年5月，先生调任中文系主任。此后4年，先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致力于中文系的人才培养和学术建设。他强调教师的学术水平决定其教学水平，采取多种方式培养青年教师，尽快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一是送出去，上委培研究生，助教进修班，或作访问学者；二是请进来，聘请南北著名学者近20人来淮北讲学，派青年教师作助手，订师徒合同，要求达到硕士研究生水平。三是就地培养，指定指导教师，开书目，指导论文，他自己就指导青年教师5名。他强调要加强科研力度，活跃学术气氛，师范院校也要重视学术研究。他经常督促教师读书，检查读书治学情况，带头坚持学术研究，并主持学院学报文科版工作，为师生选题目、找资料、改稿子，把许多人推上科研。他建立了古典文学研究室，后来发展成古籍整理研究所，是安徽省成立较早的古籍整理研究单位。他强调教师、教学管理人员要“双肩挑”，自己以高龄多病之身，有时说话、呼吸都很困难，开课竟达6门之多。在教学中，要求学生理论、知识，能力并重，多读专书，尽力参加科研活动。先生的办学方法，明显地受着当年国专办学特点的影响。他对煤师院中文系的贡献，至今有口皆碑。

84年，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校外，先生还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他是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民革常委，他参与着全省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和地方志编纂工作，担任阜阳师院、徽州师专的兼职教授，还是省内语言、文学、诗词、教学等十几个学会、研究会的理事和顾问。大量的日常事务、会议、学术交流、研究生答辩等活动占去了他的不少时间，而业余时间，又为登门请示系里工作、请教学术问题的人占去很多。而他对于学生，从来是亦师亦友的，中文系绝大多数教师都曾是他的学生。先生再忙再累，一谈到工作，谈到学问，就精神抖擞，乐不知疲。任何一个那怕素不相识的人，走进他的书房请教，他都会推开正在做的事，与之长谈，为之翻检资料，有人认为先生为别人浪费时间太多，先生动情地说，为人就要甘作人梯，就要为别人付出。他想起前辈诸老对自己的关怀教诲，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先生多次积劳成疾，又导致旧病复发，入院后收到《病危通知书》，几乎每年一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生还完成了六部著作和写了近百篇学术论文。

1982年6月写成《训诂通论》，1983年4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先生文革后第一部著作，也是自己语言文字之学的经验总结，其特点一是强调实用，要言不烦，避免琐屑；二是注意训诂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避立孤立；三是总结前人经验成果，引证有据，原原本本，防止走样；四是结合具体训诂实例，尤其是自己阅读、写作，教学及整理研究古籍中的实例，避免空谈；五是既讲正面道理，又说反面失误，正反对照，避免片面。在《后记》中，先生特标治训诂之学的五个要点：穷其源，知其变，得其据，观其巧，致其深。可看作先生治学和教人方法的归纳和总结。此书被公认为是一本理论与实际结合，知识与方法并重的初学训诂的入门必读书。90年在台湾再版。

82年10月，整理扩充《读书与治学》毕，改名《古书读校法》，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83年5月出版。此书谈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训诂以及诗词阅读欣赏的知识与方法，还谈了丛书、类书、经史要籍知识和文史常用工具书使用法，是先生承老辈学者教诲、积数十年阅读、教学、研究和整理古籍的经验初步总结，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可以看出，以上两书明显地导源于当年柳诒徵先生的指点，读书治学以知书识字为基础，也是先生写此两书的深意。出版后，受到钱仲联、程千帆、舒芜、张寿康等学者的称赞，并把《古书读校法》比之孙德谦先生的《古书读法略例》。

84年8月，将原连载于《安徽日报通讯》的谈唐宋八家的文章整理成书，名《唐宋古文八家概述》，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85年6月出版。先生此书，意在以自幼读古文所得和从唐、钱、姚、袁诸师所学，从语言学、文章学角度探讨唐宋八家古文的艺术特色，并试图为建立有汉语文特点的篇章语言学作些努力。此书比较突出之点一是就语言而谈文章，二是言“八家”亦集“八代”之成，三是注意到“八家”之间的异同得失，四是虽言文章法度但皆着实而不拘虚。舒芜先生在读了定稿之后曾写一序言，称为“以内行人，说内行话”。

从1982年起，先生承担了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刘大櫟集》的任务，同时即着手对刘氏的研究和《刘大櫟文选》的选注工作，84年完成《选注》，由黄山书社于85年7月出版。先生以对桐城文章的深入体会，加上校点、研究所得，选文44篇，既有一般选本和研究者公认的代表桐城文和刘文特色的文章，又有若干不太为人注意，却体现刘氏个性风格的文章。注释用通俗简明的语言，“略释名物训诂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认真谨慎，释皆有据，其有易滋疑惑之处，并注出所据之书，以便查考。还录有旧本评语，个别地方作了比较分析和提示性说明，以助阅读欣

赏。钱仲联先生推为普及本注释的代表。

完成于1979年的《屈原九章新笺》，此时广泛征求意见后，重新整理写定，也由黄山书社于1986年9月出版。该书综合王逸以来以至时贤的成果，以小学治骚，以文章学治骚，以史证骚，以骚证骚，理清屈原《九章》篇次，考明屈原出身、行实、卒年等屈原研究方面的重要问题。其中有许多令人叹服之处，如释《哀郢》“过夏首而西浮”之“西浮”为“迁流”，“至今九年而不复”之“九年”为“终年”即“终岁”之意，从而解决了屈原行踪与卒年中的关键问题。又如对《九章》中（《离骚》中也有）多次出现的“彭咸”，认为是楚国的生命之神、保护之神，被屈原作为安定国家、造福人民、保护民族的象征的，否定了屈原水死是从彭咸的传统说法。先生同时有一系列论文如《〈哀郢〉“西浮”解》、《释彭咸》、《关于屈原出身及被放问题的探讨》、《读骚小笺》、《屈原晚岁行踪与卒年新探》等发表，后二篇作为附录收入《新笺》。先生自35年读马其昶先生《屈赋微》以来，一直心存治骚之志，这是一部语言文学历史结合、汉宋方法兼综的著作，先生自信结论未必尽当，而方法却可以给人启迪。有关专家拟将此书收入《新楚辞学丛书》。

这几年，先生还就桐城派问题，训诂与语文教学问题，诗词研究问题，古代文论问题，文学史问题，中学教学问题、语言问题、修辞问题、古籍整理与研究问题等，写了大量的论文，发表于省内外刊物。其主要者有《读〈文赋〉私记》（《艺文志》第一辑），以刘勰《文心雕龙》有关篇章与陆机《文赋》对读，疏证众说，读懂本文，弄清作者为文用心，显示了深湛的阅读分析功力和厚实的古代文论修养。此外，研究古代文论的论文较重要的还有《曹丕文气说浅析》、《赋比兴别解》等。《别裁非学最难凭——试论清代的诗风与学风》（江苏古籍出版社《清诗论文集》）提出“清诗可以度越元明而与唐宋鼎峙”，“清代诗歌之盛与学

风紧密相连”，“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而清诗以学胜”的观点。一组考证文章如《〈利簋〉铭文商榷》、《念奴娇〈水天空阔〉作者考》、《李白词二首的真伪问题》、《李白〈蜀道难〉本事考》（载《文史》、《安徽大学学报》等），既通训诂，又审词气，结合历史，验之人事，且能博采通人，断以己意，得出新的见解。一组论桐城派的文章（载《江淮论坛》等）为后来论桐城派的专著奠定了基础。一组论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文章如《古籍校注得失例谈》等被收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还有大量的关于语言文字、语文教学、诗文欣赏、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论文，发表于《艺谭》、《阜阳师院学报》、《徽州师专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语文教学研究》、《修辞研究》等刊物。

先生于百忙之中，不废吟咏。84年秋，先生参加的《汉语大词典》编竣庆祝活动，作《与诸公游太平湖》诗：

果然高峡出平湖，竞胜天然入画图。

山水倚偎似阳朔，峰峦起伏即桐庐。

雨晴浓淡能兼美，杭颖雌雄总不如。

恰喜同舟多俊侣，真看欲界有仙都。

其时舟行山水之中，先生援笔立就，同游华东地区学者及教育部领导皆极钦佩。又有《屯溪访戴居故居》、《千帆寄示天问楼图诗赋此寄之》等。舒芜先生认为其诗“清空浓至、二妙并兼”，“直白言情，不假比兴”，最为知言。而用绝句形式写的《论桐城派》8首，《读清诗别集》26首，《陈迹冬寄赠〈闲话三分〉赋此题之》10首，诗才学养，两相辉映，为人乐诵。

1985年元月，原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改为古籍研究室，与系并列，先生出任研究室主任，因病住合肥安徽医科大学附院二年多。住院期间，仍坚持完成《刘大櫟集》校点，（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主编煤炭师院与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合

办的《古籍研究》杂志，负责全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文科组的工作。先生时任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委员，《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社联副主席。同时任安徽省和庐江、枞阳、肥西等县地方志编纂顾问。先生在医院，有次病危，自料不测，忽接一徐州师院研究生来信请教，并言欲前来访学，先生闻之，忽瞿然振作，而从此好转。先生盖真以学术为生命者。

1987年6月，先生调至合肥安徽省教育学院。先生最后的8年，主要精力集中于《安徽古籍丛书》的整理出版和主持几部大型资料书的编纂，同时进行几本总结性著述的写作。

《安徽古籍丛书》的整理，先生从制定计划、确定书目、选择底本、搜集资料、物色人选、明确要求，一直到指导点校、审订书稿，安排附录、撰写序跋等，都亲自过问，有许多工作是亲自动手，先生把这一工程视作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为要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安徽，无愧于前辈，无愧于子孙。他废寝忘食，甚至可以说生死以之，多次病重住院，在病榻上还在审阅书稿。《安徽古籍丛书》中有许多著作，是他敬仰的前辈甚至老师的，他满怀深情地撰写了大量的前言、序跋、附录等。如《文学研究法》序，《方望溪遗集》序，《读〈老子注三种〉》，《萧穆年谱》、《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抄本忧庵集》序等。他对整理质量要求极严，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1991年，《安徽古籍丛书》已出10余种，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评比中获一等奖，先生感到无比欣慰。他曾撰一联，中有“八皖典籍，数载辛劳千载业”，“七旬老翁，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可见当时的心情。同年，先生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先生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学者，亲自主持，编纂《续经籍纂诂》、《汉魏六朝诗纪事》，评点校注《古文辞类纂》，校注辑

补《中华画学论著集成》(即《美术丛书》)等。89年春节,他在《寄〈纂诂〉诸公祝春节》诗中写道:

东风送暖入屠苏,举酒谈经意兴舒。
又是一年逢令节,旁搜千载出新书。
门多喜气春前酿,学贵精思宋后儒。
南北知交同属望,名山事业在吾徒。

除《纪事》编纂未竣外,其余多种皆送交有关出版社出版。

先生早在多年以前,就想认真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成果,拟编《诗文论丛》。70岁生日时,在友人、学生的帮助下,编成《吴山萝诗文录存》,91年8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此书仅收录旧体诗和短文七八万字,是先生50余年之诗文写作和学术短文的极小一部分,早年之作尤少。先生晚年主张诗文写作之“文”必与“学”通,故所选以论学谈艺、征文考献者为主,并非尽为汰除少作。

1989年11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语文阅读欣赏例谈》,这是先生一生读书、教书和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学术研究的经验总结,书中谈读书学习,谈点校注书,谈文艺理论,谈艺术欣赏,谈作家研究,谈论文写作,所谈皆以自己的有关论文为基础,有理论、有知识、有方法,具体全面,征实可信,体现了语言与文学、阅读与整理、教学与研究相通的特点。受到高校文科师生和自学青年的普遍喜爱。

1991年11月,台湾贯雅文化公司出版了先生的《古籍整理研究通论》(繁体字本)。先生读书、治书、教书、写书一生,晚年尤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久欲作一总结,示人途辙。本书从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和优点谈起,首论“言能尽意,语有达诂”;其后就辑佚、辨伪、版本、校勘、标点、注释等文献整理方法一一详述细论;最后还谈到诗文的篇章教学和分析欣赏;并以自己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实践的有关材料作为附录。内容充实,

胜义纷陈。正如书前提要所言：“书中内容是他经过六十余年读书、教书与整理古籍累积经验之结晶，既博采古今通人之论，更有着他的博考深思所得的创见，是校读古书的指针，是研究国学的津梁，也是大中学校文史教师所不可不读之书。”书中将读书、教学、整理、研究视为一体的观点，确为先生独到之见，非身体力行、卓见深思者不办。先生在《自序》中就此观点论之尤畅：

古籍整理与古代文史研究及诗文教学，其功力与方法，实无异处。盖皆要读古书，考古事，知人论世，赏奇析疑；其不同者，只在于：或点注在书上，或写在稿纸上，或讲在嘴上与抄在黑板上而已。

1992年5月，先生将研究桐城文派所得整理成书，名《桐城文派述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先生最后一部完成的专著。书中集先生自幼研读写作、师友传习所得，加之博考深思，其有新见或突出特点者约为十端：

一、“桐城文派”思想渊源出于“泰州学派”和“颜李学派”。

二、“桐城文”是文艺散文，名为“古文”，实属“新变”。

三、“桐城文”作者多为教师，写的是简洁传神的“小文章”。

四、“桐城文”本非封建文学“正宗”，故自然也非“谬种”。

五、“桐城文”追求“雅洁”，讲“词必己出”、“文从字顺”，能“把文章写通”，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

六、“桐城三派”——“文派”、“学派”、“诗派”有区别又有联系，“散文诗化”为“桐城文”神韵之由来。

七、论及“阳湖”、“湘乡”及“桐城文派”之外之文，明非“桐城文”独尊，亦明“桐城文”为用之广。

八、论人重点在其生平与学风、文风中有研究价值之处，论文结合本文，以避空言。

九、对“桐城派”重要理论著作和其它重要资料亦加以介绍。

十、立论持之有故，实事求是，注意吸收前人与时贤之论，不拘门户，惟求真切。

先生在《前言》中最后希望此书能有补于“成文章学之专书，助语文课之讲析”，并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七十老翁，断不敢以无实之言，误人子弟也。”

先生除工作与著述之外，还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专门人才，当前安徽省从事古籍整理和古代语言文学研究的，几乎没有不承先生之教的。他除审订书稿，还撰写大量的序言、书评，奖掖后进，支持新秀。平时不管是在家，还是住院，都是论学之友常满，问字之客不绝。

先生晚年之诗，诗风由唐入宋，渐趋于清，主张诗与学问文章结合，其论诗绝句有“嵇康清峻宛陵雄，诗学诗功事本通，莫以玄谈文浅隘。从无妙手出空空”，是他《论清代的诗风与学风》中观点的概括。而为人的一幅题字，更道出了他一生诗学心得的结晶：

去年有人问作诗，曾以此告之：一曰起处用反笔；二曰以单行之气寓于对偶之中；三曰虚字传神；四曰篇终接混茫。无一字无来历而又无一语为人道过。此查他山，姚惜抱不言之秘也。

此时，先生之诗颇多。如：

海外还余弟与兄，新来消息托邮程。

遥知月夜思归处，好及春光返棹行。

《通鉴》家风传子侄，青毡故物付儿甥。

工农商学行行有，王谢门庭恐未精。

（《七十生日述怀》之八）

公为华夏奇男子，我在门墙本嫡孙。
喜见丹铅成定本，更扶白发诵黄昏。
古人不朽于君托，后世相知赖此论。
东望淞云招毅魄，九原定见拭啼痕。

（《题孙文光校〈北山楼集〉后》）

当年衫鬓两青青，小别犹愁感不禁。
五十三年徒转眼，百千万事总伤心。
倘容欧九编梅集，惜少王维写孟亭。
注海倾河唯有泪，为君和泪传儒林。

（《哭懋园之二》）

亲情、师情、友情，真挚浓郁，不假修饰而自能感人。又有合肥包公墓园楹联：

廉吏可为，来者是式；
故乡更美，公乎其归！

先生晚年对骈文极感兴趣，曾有文论述骈文特点，喜读唐刘知几、陆贽和宋代汪藻之文，有时亦用骈体写作，以为骈体有古文难达之意致。《〈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后记》、《读文赋私记》小序即用骈体。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冒叔子先生诗序》和《潘成诗联集评序》。

自怜生晚，幸及坡谷之门；岂意衰迟，复接晁秦之后。
病坊执手，遂卅年愿见之私；客馆论诗，有四海皆空之概。
勿谓中国之无人，每抚斯编而增壮！

（《冒叔子先生诗序》）

山中昼永，正好看花；槛外天高，不妨馥气。倘吟旌载归赤县，请莅黄山。试登三天子鄣，契烟霞痼疾之缘；更于五百年间，证名世文章之盛。

（《潘成诗联集评序》）

先生曾为省诗词学会、合肥老年大学讲授诗词作法，培养了

不少诗词爱好者和诗词新秀。

1994年夏，先生自感严重不适，大异于往年，但未放松工作和写作。6月份，主持《安徽古籍丛书》编审会议，提出一整套新的出书方案。七、八月份，促成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淮北煤炭师院三校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恢复停刊6年之久的《古籍研究》杂志，他约来一批著名学者的稿件，自己也写了最后一篇论文《论“同光体”与〈散原精舍诗〉》。九月中旬，在合肥主持召开了杂志第一次编委会，并作为主编审阅了第一期的稿件。此后，他抓紧《梅尧臣年谱》、《题画诗作法》、《高级文秘教程》、《商邃室论文》、《勉堂诗话》、《勉堂读书记》等著作的整理定稿。

正当先生作学术道路上的最后冲刺之时，1995年元月28日，突然因病住院，2月1日凌晨，先生溘然长逝。骨灰安放于合肥西小蜀山前16号公墓。

先生一生致力于读书治学，教书育人，学有渊源，见有独到，学术与人格合一，著作与教泽并存。钱仲联先生序其诗文曰：

七十年前，北庠大师姚仲实先生以诗古文启迪后进，不侈谈考据，然亦通于训诂，明于制数。先师唐蔚芝先生，出清末考据家黄元同先生之门者也，创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培育多士，虽讲义理，亦重文章。而南庠大师柳君诒徵则考镜源流，平章学术，益宏实斋之学，然亦不薄诗文。吴君孟复著唐氏弟子籍，又亲承姚、柳诸老瞽欵。考据词章融于一冶，沐皖学之泽，纬以新知，开拓宦实。既审文理以通故训，……又考源流以研究诗文，……虽为诗文，实皆述学，沈浸秣郁，提要钩玄，考订精严，文词尔雅。是合皖江南北之长，果能善用以相济者矣。

要之，先生之为人为学，可以公、勤、实、通四字概之。凡

事出以公心，据以公德，他律己、助人、尽职、敬业，维护集体之公、学术之公，事业之公以至国家之大公。尊重前辈，扶持后进，遗惠将来，一生为学术、教育鞠躬尽瘁，而一身之外，别无长物，此之谓公。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治学，无一日不工作，无一日不助人，乐此不疲，乐以忘忧，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著作等身，桃李满园，此之谓勤。读书、治书、教书、写书，实事求是，不为臆说，学有师承却能不拘门户，转益多师而又深造自得，敢于独抒己见，不依傍，不媚俗，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和正视真理的勇气，“苟终无足以起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

（戴震语），终身奉之，且深有自知之明，不断改旧，不断求新。此之谓实。学综汉宋，文擅韵散，会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于一途，融目录版本校勘训诂为一体，合阅读整理研究教学为一事，著作十余部，论文百余篇，犹未尽其才，学科跨度之广，知识涵容之富，令人叹为观止。此之谓通。先生爱读郑樵《通志总序》，常言“会通之义大矣哉”，终生追求之学术极致在“通”。昔萧一山先生谓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所举三种境界，可以喻为学之“博”、“约”、“通”三个阶段。先生早年务“博”，中年返“约”，而晚年即已臻于“通”的境界。

先生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古籍、诗文写作和教书育人，不敢以学者自谓，不敢以诗人自居，即使是对于学生，亦以半师半友处之。“青史他年倘定评，儒林文苑枉纷纭”（《七十生日述怀》之四），然而先生确实是令人景仰的学者和教师，“经师兼有人师重”（凌廷堪诗句），先生无愧，亦无悔。

先生未竟的事业，尤其是“振兴皖学”和建立中国的“篇章语言学”的遗愿，将留给后学者去完成。

作者工作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古籍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